

家庭相册

父爱无垠

□王淼文/图

小时候，当老师的父亲远离家乡工作，故与父亲见面机会甚少，思想交流乃至父爱温存不多，觉得父亲有点“冷”，所以对每天照顾生活起居的母亲很依赖，觉得母亲才是家庭的主心骨，久而久之便对父亲有些漠视。直至后来父亲离开我们，我却常常忆起父亲，他对我成长的期望及关爱之情，一桩一件竟像电影似地在眼前叠现，一个慈爱父亲形象在眼前清晰起来。

父亲平时不苟言笑，但少说多做、处事执著认真是他的风格，即使是对我们的教育也从唠唠叨叨，只是偶尔对母亲略作提示，点到即可。记得我都快到上学的年龄了，仍是母亲给我洗澡。父亲回来看到后，直皱眉头，然后悄声告诉母亲，孩子大了该学会自己做事，直到知道我已经能独立完成洗澡“任务”



后，方才作罢。“玩物丧志”是做老师的父亲坚持的观点，但他还是理解孩子贪玩的特性，那时我多是玩泥沙，从不敢生出买玩具的奢望。有天看到邻居小伙伴有一套锣、

鼓、钹乐器玩具很吸引我，我眼睛都看直了，天天跑去凑热闹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我压根儿没想到，有一天父亲不声不响就把一套同样的玩具递到我手里。贫穷的孩子一下子有了贵族享受，真

是心花怒放，那套爱不释手的玩具一直被珍藏至成年后，父亲给予的惊喜也牢记在心。

偏僻闭塞的农村几乎没有文娱活动，已经八岁的我还不知电影为何物，细心的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，有天他从学校回家后悄声告诉我说：“走，带你去城里看电影。”说罢，我便坐上父亲的自行车后座，去城里看了令我陶醉的人生第一场电影。翌日，我绘声绘色地给小伙伴讲述看电影的经过，告诉他们电影是在一间漆黑大屋里，贼亮刺眼的光柱射在一块白布上，映出很多与我们一样的真人故事，煞是好看。一位大哥哥听后问我所看的到底是电影还是舞台剧，我被问得一头雾水，父亲笑笑，并无答案，过后又找机会带我去看了一出舞台剧，于是我就有了电影与舞台剧相区别的答案。这是父亲对我

最初的艺术启蒙。

父亲一直以润物无声的方式给我上进的启迪，他知道我学习好、爱阅读，于是从我二年级起订阅了一份儿童杂志，这是同龄伙伴绝无仅有的待遇，很多人连一两块钱的学杂费都交不起，我却还有钱订课外书刊，所以格外珍惜。

上高中那年冬天，我从学校到偏远农村去搞社会实践，父亲惦挂着我衣着单薄而辗转送来寒衣。我无论晴天雨天都要步行两小时到城里上学，父亲竟节衣缩食好几年凑够一百多元买了辆自行车供我使用。这就是父亲！

我虽曾认同旁人眼里的父亲有些木讷，以及平时母亲时有对父亲的嗔怪，但我感受到的父爱却是无处不在，父爱无垠，外冷内热，一辈子用他特有的方式默默照耀、温暖着我。

真情万里亦生辉

——读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

□李仲

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践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，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就是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聚焦最基层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深度贫困村的普通村民，运用散文化的叙事技巧，融入彝族文化等多元艺术元素，生动再现了一个深度贫困村的脱贫历程。

主人公林修是一位年轻干部，挂职锻炼到四川省马边县雪鹤村任驻村第一书记。雪鹤村是虚构，但马边县却是真实的存在，是国家开发扶贫工作重点县。从北京到马边，不仅是空间距离上的遥远，也表现为思维意识上的巨大差异。正是这强烈对比，凸显了林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担当。

在雪鹤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子里，林修用真情获得了村民的信任，拉近了与村民的情感距离。刚到雪鹤村，林修就遇到了突发重病的彝族村民吉克乌乌，他把她连夜送到了医院。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时，林修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当医生询问他与患者的关系时，“她是我的村民！”这近乎本能的回答林修脱口而出，流露出他视村民为亲人的真情。后来，他又放弃回北京过春节与家人团聚，只为照看突然丧夫的王太因老人和她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。这一切都是出自林修的本心，丝毫没有造作之嫌，让读者感到很真实。

对村民的诉求，林修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装了一麻袋麻烦的村民鬼针草，经常提出些胡搅蛮缠的要求，林修对此坚决说“不”，也表现出驻村干部坚定的原则性。他要让村民知道，驻村干部不是来当雇工做保姆，也不是来镀金刷经历当太平官，而是来真正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。

修建学校、聘请老师，让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学；集资修路，解决出行难，突破制约商品流通的瓶颈；引导村民入股建合作社，农产品实现集约化经营……这些做法，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总归有先例可循、政策可依。如何解决一些五保户建房资金困难问题，着实考验林修等驻村干部的能力。最终，他们通过动员这些村民将房子所有权预先抵押给村集体，由村集体负责翻修扩建，然后租给五保户居住，让村民不落一户地都搬进了新家。

告别终将到来。因为有着对村民的真情，所以林修才能攻坚克难，不辱使命，在那个丰收的秋天说出这样一段道别：“雪鹤村有幸，我们也有幸，个人的力量很渺小，但我们种下的精神和信念，会在这片土地上成长。”这段话道出了很多驻村干部的共同心声。其实，在驻村过程中，他们种下的还有共产党员的形象，这些形象以不同的姿态留在了村民心中，印刻在了他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。

青春岁月

我的煤矿 我的青春

□肖功勋 文/图

人人都有自己的青春。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煤矿，但从24岁到34岁，我的10年青春全在煤矿度过。多少年后的今天，在煤矿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。

刚进煤矿，我被分配在采煤队。工友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我们亲密地成了兄弟，住进宿舍，在一个食堂吃饭，穿相同颜色的工作服、长筒靴。

早上六点半，矿山的上空拉响了汽笛。我简单套上两件衣服，刷牙便到食堂吃早餐、去澡堂换衣服，然后戴着安全帽、矿灯和钻杆，准备下井。

矿井的交通工具——猴车，每隔3米一个座位，由一个简单的平铁片、两个脚踏还有一根柱子组成，跟旅游区的吊索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更简陋些罢了。井下的巷道四通八达，像一座地下迷宫，有些地方水深及膝。在深深井巷，被誉为矿工“眼睛”的矿灯显然很重要，但晃来晃去也只能照到面前巴掌大的地方。无论面向何方，除了黑，还是黑。衣服是黑的，道路是黑的，人脸是黑的，呼吸是黑的，似乎连空气也是黑的。

下到煤巷后，我们一天的工作——打眼、放炮、架棚、撬煤正式开始。说是煤巷，其实就是一个用树木撑起来的洞穴，最低处不过一米。我们只得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游走，像一群深海中的鱼。虽然极力躲避可能的伤害，仍然能时时感受到安全帽与头顶硬物交手过招时不间断的撞击。我们班年龄最大、经验最足的是大工，其余的是小工。大工负责挖煤，小工负责把挖出来的



煤集中到矿车，再送往罐笼。挖煤需要经验，从哪里挖怎么挖，很重要，挖不好就会冒顶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

开采的煤层只有0.4米高，我们只好匍匐在地上作业。在不透风的密闭空间里，机器的鸣响在煤壁间疯狂奔跑，循环往复地刺激人的耳膜。这样的工作环境，我们的交流基本要靠大声吼叫或者比划手势来进行。

放完煤炮，工友拖着一个船形的簸箕进来拖煤。煤要用人拖到煤巷的天眼里装上矿车，然后将矿车拉到井底车场，绞车再将矿车拉上去送到罐笼运输到煤仓。我和另外一个人负责挖，其他的人负责运输。一个班大约可以出5吨左右的煤，那时出一吨煤挣20块钱工钱，每班6人均大约17块钱。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，工友们感到很满足。

安全生产关系到企业兴衰和矿工家庭幸福。每个人都在心里祈祷：我们不要荣华富贵，不要

功名成就，只希望能很好地活着。那时，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：生产任务再紧，也不能要一点带血的煤炭。然而，对于刚下井的我来说，心里仍然紧张，总是担心有冒顶和透水事故。因为在灾难面前，纤细又脆弱的生命实在不堪一击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正在工作面铲煤，一位老矿工突然让我赶快撤退，说顶板马上就要垮塌。没等我撤出几步远，忽听一声巨响，塌下了一块足有十多吨重的煤矸石，砸在了我刚才站着的地方。我被惊出一身冷汗。从这一事件中，我才懂得了要想做一名矿工原来需要很多学问和经验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向老矿工虚心学习，很快掌握了敲帮问顶、凿岩爆破等井下作业技能，逐渐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矿工。

离开煤矿近20年了，手指上仍有永远洗不去的煤黑。我越来越相信，那是一种青春的颜色，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颜色，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。

书海掠影

